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3期（民國103年3月），133-15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灣主體、中國屬島、或其他？——論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所揭露的美國對台政策*

陳儀深**

摘　要

葛超智（George H. Kerr, 1911-1992）的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一方面傳達他對戰後台灣的觀察，特別是對二二八事件的見證；一方面陳述他對台灣國際地位（未定）的看法以及對美國對台政策的批判。該書揭露台灣如何「被出賣」的敘事，包括：1945年美軍如何護送中國部隊進入台灣、1947年美國政府對台灣二二八事件的殘酷鎮壓「保持中立」等等。其次，葛超智也注意到1949年美國軍方不同意國務院的「拋蔣棄台」路線，以及1950年國務院在韓戰發生以後對台灣地位認知的轉變。本文認為葛超智對台灣問題的深入認識其來有自，除了曾在台北擔任英文教師（1937-1940）外，他從1942年到1947年在*Far Eastern Survey*陸續發表了五篇文章，很像人類學者或社會學者的「參與觀察法」或「持續觀察法」。本文認為葛超智所關切的不僅只是二二八事件中的是非或美國某一任政府的對錯，而是1940到1960年代冷酷的國際現實之下台灣人的苦痛。不過，從已經解密的美國外交檔案可以看出，當時美國國務院對台海情勢的充分掌握以及決策過程的多面性、矛盾性，吾人不難從中體認戰後台灣命運之所以然。

關鍵詞：葛超智（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台灣地位、台美關係、卜睿哲

---

* 本文曾於2012年10月20、21日發表於台灣教授協會主辦之「從當代問題探討台灣主體性的確立」學術研討會，今經匿名審查人指教之後業已補充修改，使本文更趨周詳、更少錯誤，感謝之至。收稿日期：2013年7月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年12月27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　言

2012 年 9 月 13、14 日，國史館舉辦「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邀請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發表主題演講，題目是〈對中華民國史的一些省思〉（Random Thoughts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1]由於卜睿哲與台灣政界的藍綠陣營皆有交往，角度如何俯仰取決，比較可以兼顧雙方立場？引人好奇。他在演講中指出，如果不是因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快速成長，並且對涉台議題有清晰目標，原本台灣內部對於過去歷史的觀點分歧、對中華民國認同的程度不一並不是問題。但事實如此，台灣若不同意（面對）這些基本政治問題的存在，將使自己處於極度弱勢的位置。卜睿哲接著評論，2012 年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去北京傳達的「一國兩區」論述有兩個爭議點，一是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是否歸屬「中國」（姑且不論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戰之後台灣有歸還「中國」嗎？在這個問題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觀點一致，認爲已經歸還，而民進黨的看法則是並未歸還；另一個爭議是，台灣目前是一個力求進入國際社會並解決兩岸爭端的「主權實體」嗎？在這個問題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答案是否定的，而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立場比較一致均持肯定態度。

上述卜睿哲的分析顯示，台灣政治已經不是戒嚴時代國民黨政府一方面與對岸「漢賊不兩立」、一方面與黨外民主勢力處於敵對防範的樣態。今天的現

[1] 卜睿哲出生於 1947 年，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歷任美國國防部、國務院、智庫，關注亞洲國際事務逾 30 年，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理事主席（1997-2002），現任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東北亞主任（2002- ）。卜睿哲聲稱「台灣可說是我一生事業最重要的中心」，他曾在長期友台的眾議員索拉茲麾下服務九年半（1983-1993），1995 年出任東亞事務國家情報官，2002 年離開公職以後即開始撰寫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這本書；詳見中文版作者自序：〈以穩定爲前提，解開兩岸死結〉，收入氏著，林添貴譯，《台灣的未來：如何解開兩岸的爭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16-17。〈對中華民國史的一些省思〉主題演講中、英文版則皆收入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13），上冊，頁 1-28。

實是有些議題國、共一致，有些議題國、民一致（從而今日民進黨為了避免兩面作戰，有人開始主張要民、共交流）。關於二戰之後台灣有否歸還「中國」的問題，固然應回歸國際法、國際規範的討論，但就現實政治而言，國共兩票對民進黨一票，民進黨實有必要從美國找到支持的一票才能抗衡。

美國的立場，剛好從上述同一場討論會的另一篇論文〈戰略模糊的起源：1950 年代美國對台海「維持現狀」政策的形成〉，所引述的美國共和黨政綱（2012 年 8 月 28 日）可知：「基於該島未來必須以和平方式、並透過對話與臺灣人民同意來解決的原則，我們反對任何單獨改變臺海兩岸現狀的行動。如果中國違反這些原則，美國根據臺灣關係法，將會協助臺灣自我防衛」。以及美國民主黨政綱（2012 年 9 月 5 日）：「我們持續保持對一個中國、臺灣關係法，以及合乎臺灣人民意願與最大利益來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承諾」。[2]這樣的描述其實只能說明長期以來（至少是 1958 年第二次台海危機以後）美國政府採取的立場：包括維持現狀（或者說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以維持此地區的和平穩定），以及戰略模糊（萬一發生軍事衝突，不明說美國是否會以武力介入），但無法說明此種立場形成「之所以然」。

若要追本溯源，可以參考更早以前，即 2005 年 11 月 24、25 日同樣由國史館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中，賴怡忠教授[3]所發表的〈1971 年以前的美中台三角關係——美國對台政策變遷：由「地位未定」、「兩中」、到「一中」的轉變〉。該文一樣把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當作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由來，而在那之前歷經「台灣與中華民國分開時期」（1943-1945）、「放棄台灣時期」（戰

---

2 作者張淑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其博士論文略經修改後出版為《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衛城出版，2011）。該文後以〈不解之解——美國對臺「戰略模糊」政策的緣起與發展〉為題，收入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頁 715-755；美國共和黨、民主黨政綱內容轉引自該文，頁 715。

3 賴怡忠（1966- ），1999 年獲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博士，曾任民進黨駐美代表處主任、台北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室主任、台灣智庫國際部主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及國際事務部副主任。參見〈賴怡忠〉，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B4%E6%80%A1%E5%BF%A0。（2012 年 10 月 12 日檢索）

後二二八事件至 1950 年杜魯門總統的「不干涉聲明」）。[4]但筆者認為就 1940 年代美國對華政策而言，這樣把台灣和中華民國分開是不必要的；事實上，1949 年 8 月美國國務院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乃至 1950 年 1 月 12 日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的公開演講，列舉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一條防線卻有意把台灣除外，所放棄的何止是台灣？當然是連中華民國一起放棄；進一步說，所謂「兩中」到「一中」的轉變，所指的到底是對中政策還是對台政策？會不會是當時美國根本沒有對台政策，只有對中政策？眾所皆知，1945-1950 年之間美國致力於調停國共紛爭，應該沒有兩中、一中的選擇問題，而且當時美國的主流意見認為，依照開羅會議公報，已經把台、澎交還中國，理論上台灣只是「地方」，因此沒有所謂對台政策。不過，當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敗象日趨明朗，蔣介石逐漸安排以台灣為退路的時候，美國也積極思考保衛台灣免被赤化的方案。這一切關於戰後台灣命運與中國的關聯問題，恰恰都是葛超智（George H. Kerr, 1911-1992）的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所關切和探討的意旨。一方面由於筆者於 2012 年應本土社團「台灣教授協會」[5]之邀，參與重新校註《被出賣的台灣》一書，[6]從而認為探討戰後初期葛超智所見證的美國對台政策，對於上述「二戰之後台灣有否歸還中國？」以及後來的台灣是否或如何「成為一個主權實體？」等爭議，具有追本溯源的作用；加以今日發展中的美、中、台三角關係為認知背景，來回頭檢

4 該文後收入薛月順執行編輯，《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新店：國史館，2007），頁 25-44。

5 台灣教授協會（Taiw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TAUP），簡稱台教會，於 1990 年 12 月 9 日創立於台北市，創會時期會員 83 人，首任會長為林玉体。是一個由學術界人士組成，不定期舉辦各種座談會、學術研討會，以促進政治民主、學術自由、社會正義、經濟公平、文化提升、環境保護為宗旨的台灣本土社團。參見〈台灣教授協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5%99%E6%8E%88%E5%8D%94%E6%9C%83。（2013 年 6 月 30 日檢索）

6 本書於 2014 年 2 月下旬出版，見葛超智（George H. Kerr）著，詹麗茹、柯翠園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台灣教授協會，2014）。之所以要重新校註《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乃因該書於 1960 年代後期至 1970 年代初期由留美的一群台灣青年翻譯為中文時，限於專業領域以及參考資料不足，而有一些錯誤或不妥的地方，2012 年參與重新校註的學者包括蘇瑤崇、何義麟、陳翠蓮、張炎憲、陳儀深等五位。

視葛超智的這本書，仍具有歷久彌新的時代意義，爰撰寫本文。

二、葛超智及其《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對台灣的重要意義

葛超智出生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二戰之前在日本讀書（1935-1937），隨後來台北擔任英文教師（1937-1940），1940 年至 1942 年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1942 年珍珠港事變之後，他向陸軍、海軍、國務院「自我推薦」願加入軍職，但只有陸軍邀聘他在華盛頓五角大廈擔任「台灣專家」的文職工作，時間約在 1942 年初至 1943 年底。1943 年 12 月 30 日起轉任海軍預備役上尉，當時海軍上將尼米茲（Chester William Nimitz）曾有佔領台灣的所謂「鋪道作戰計畫」（operation causeway），葛超智即參與其中的「台灣研究組」，擔任「該單位主管和民政手冊主編」（officer-in-charge and editor-in-chief of the Handbooks）。但是僅僅一年後，即 1944 年 11 月，因羅斯福總統聽從麥克阿瑟的建議優先佔領菲律賓，「高級統帥不再將注意焦點放在台灣了」，[7]「台灣研究組」於是解散；葛超智轉任華府海軍情報處武官，並擔任普林斯頓及哥倫比亞大學內海軍軍政學校的講師與研究員。戰後葛超智以美軍觀察團成員的身分回到台灣，不久即被指派出任美國駐台副領事，有感於國府接收後的弊政，加上 1947 年二二八事件期間親眼目睹鎮壓屠殺，曾經撰寫大量報告呈給南京大使館及華府國務院。由於他批判國府的立場，使他難以繼續在台任職，於是他在 1947 年 4 月 4 日分別向國務院與大使館辭去副領事職務（辭職的理由還包括人身安全遭到恐嚇威脅），但一直到八月底才正式完成了辭職手續。[8]

7 這是葛超智在《被出賣的台灣》中的措詞，見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 60；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Irvine, CA: Taiwan Publishing Co., 1992, second edition), p. 31。

8 詳見蘇瑤崇，〈沖繩縣公文書館藏葛超智（George H. Kerr）臺灣相關資料與其生平〉，《臺灣史研究》，卷 18 期 3（2011 年 9 月），頁 237-241。

然而，1950 年代葛超智因美國軍方委託，親至沖繩從事田野研究，於 1958 年出版《沖繩：一個島國的人民及歷史》（*Okinawa：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大約此時他亦已寫就《被出賣的台灣》，而於 1965 年公開出版。葛超智在《被出賣的台灣》自序中說，該書是根據他「參與台灣事情的三十年經驗」，並廣泛引用官方資料，台北、東京、上海的報紙以及私人信函，此外也引用聯合國救濟總署官方報告和許多總署人員的信函；就學術而言實屬先驅性的、不可忽視的著作，所以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教授史卡拉必諾（Robert A. Scalapino）稱讚說：

> 像柯喬治（George H. Kerr）那樣有資格來發表對台灣問題之看法的美國人極少。……他曾在各種危機時住在台灣，並且和台灣人共事，看到他們的一些勝利和許多悲劇。凡讀過本書的人，一定會知道作者對台灣人要求獨立的願望具深切的同情。……要忽略柯先生的提案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曾收集了太好的證據。[9]

尤其是在那戒嚴封閉的時代，許多台灣青年負笈美國，對於台灣相關的知識與訊息求知若渴，葛超智這本書正好滿足了需求。例如 1960 年代，Kansas State University 是美國大學率先發生「台灣學生活躍集結」的先驅校園之一，1966 年在那裡擔任同鄉會會長的莊秋雄，就坦承該校圖書館收藏葛超智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造成他「在思想上很大的 impact（按：衝擊）」。[10]其次，一位荷蘭籍的台灣女婿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1970 年代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碩、博士學位，同時加入國際特赦組織成爲會員，且擔任過該校的國際學生會會長；他因結交來自台灣的留學生而開始關心台灣問題，遂到圖書館閱讀相關資料，「像是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以及 George Kerr 的 *Formosa*

9　所引葛超智的自述俱見〈謝言〉（Acknowledgments）以及史卡拉必諾（施樂伯）的〈前言〉（Foreword），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13-19；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p. xiii-xix。

10　陳儀深訪問，周維朋紀錄，〈莊秋雄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陳儀深訪問（下略），簡佳慧等紀錄（下略），《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 329。

Betrayed，這兩本書提供很多的資訊，讓我大開眼界，從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到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11]此外，葛超智研究台灣的心得不是只透過出版書的方式傳播，先前已透過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著名的 3F（Formosans' Free Formosa，1956 年 1 月 1 日成立）成員盧主義，1950 年代就到美國求學，他回憶當時曾把圖書館所有有關台灣的書都讀過，他說「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 George Kerr 在 *Far Eastern Survey* 中的兩篇文章，一篇寫〈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與經過〉，另一篇則是〈三月屠殺〉（March Massacre）。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歷史學家不帶任何感情、只做事實分析的文章，……頓時眼界全開」。[12]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的駐外單位也注意到葛超智該書的出版，1966 年 7 月 15 日「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第二一八次會議」的紀錄就談到：「喬治·卡爾（按：即葛超智）於本年初間出版一本『台灣被出賣了』的專書……亟應賡續施以駁斥」。[13]不久，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就在保守派季刊《現代》夏季號中評論葛超智該書「充滿謠言」，「是歷史學家霍夫斯特所稱的『偏執狂式』的主要例子」。[14]

以下，讓我們先進入該書的歷史敘事。

---

11 陳儀深訪問，吳佩謙紀錄，〈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先生訪問紀錄〉，收入《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頁 510。

12 陳儀深訪問，鄭毓嫻紀錄，〈盧主義先生訪問紀錄〉，收入《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頁 86。

13 〈摘錄：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第 218 次會議議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北美司檔案》，檔號 406/0071，「僞台灣獨立聯合會・第六冊（1965 年 7 月-1967 年 1 月）」。

14 〈中央通訊社參考消息央秘參（55）1032 號：薛光前駁斥卡爾著作〉（1966 年 8 月 5 日發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北美司檔案》，檔號 406/0071，「僞台灣獨立聯合會・第六冊（1965 年 7 月-1967 年 1 月）」。

三、如何出賣？——《被出賣的台灣》書中的相關敘事[15]

（一）美軍護送中國部隊進入台灣

〔1945 年〕十月十五日，美國第七艦隊護送兵船進入基隆和高雄港。船上載的是國民政府的部隊第六十二師和第七十師，總數超過一萬二千人。他們心裡非常明白，在台灣島內靠近港口的某些地方駐有日本軍隊。

他們根本就拒絕上岸。在基隆港口，中國軍官要求美國先派遣一個先鋒隊進入島內（當然是美國隊），先穿過那峽谷到十八哩外的台北去看看，這個請求把美國人弄得驚訝不已。中國軍官聽說日本的敢死隊還在山中出沒，美國人被弄得沒有辦法，只好把他們罵出船外，強迫他們上岸。在高雄港口，美國人因為急於要清理運輸，不得不威脅要把中國部隊強丟到岸上去，否則那些不情願的船客根本就不敢進入「虎穴」。

這真是不吉利的開始，尤其這些事件都被台灣人看得清清楚楚。一下子之間，消息廣泛地傳開了。傳聞是不會減少的，沿途的台灣人都在譏笑那些踉蹌、毫無紀律而又污穢的中國部隊……。

這些公開的侮辱，日後招致了許多個人的悲劇和殘酷的殺身之禍，因為……中國人的面子是比生命還可貴的。[16]

（二）美國政府對 1947 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殘酷鎮壓「保持中立」

三月二日在領事館，我們忙了一早晨，調查美國公民的住處，和聯合

15 本節以下的摘錄皆取自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此一版本。各小節小標題爲筆者所加。雖然這中譯本有些缺點，但由於此一版本在台灣已甚普及，爲便於讀者查考仍予採用，必要時附上原文或以註腳補充。

16 本小節引文參見：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94；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p. 73-74。

國救濟總署的官員談論緊張的局勢，並且準備向南京的大使館提出書面報告。我們的工作被一個台籍醫生的來到所打斷。這位醫生跟幾個朋友帶來一顆軟鼻子彈〔dum-dum bullet〕。這顆子彈是前天中午一個路過的巡邏在任意開火時射入他的醫院，剛好打穿在診所架上的一部厚厚的醫學書。他要求領事館向有關當局提出抗議。理由是國際協定上明文禁止使用軟鼻子彈。書本和子彈證實國府軍確曾使用過這種非法武器。

領事館表明了立場，認為這不幸事件是中國兩個集團的內部糾紛，美國沒有理由介入純屬省行政長官和他轄區裡人民間的任何糾葛。[17]此刻的台灣已是中國的一部分。

既經拒絕受理，他們就把這顆軟鼻子彈拿到聯合國救濟總署辦公處，把這子彈包好附上一紙條，請求將這顆軟鼻子彈送到聯合國去做指控陳儀政權不遵守國際法的明證。[18]

我永遠忘不了四位服飾良好的年輕人眼中所流露的無言申訴，這四人曾在三月十三日中午經過我們掛著帶保護色彩的美國國旗的門口，他們的手臂被反綁著，脖子被銳利的鐵絲捆住，四人被繩子連綁在一起，如此被驅向附近基隆河河堤上的刑場。衣衫襤褸的中國兵以刺刀頂著他們前行，當他們看到我吉普車上所掛的美國國旗時，向我致了一個他所能想像的最漂亮的禮。[19]最簡單的說，這就是出賣：台灣人向我們

---

17 根據美國政府檔案，1947 年 3 月 3 日下午台北領事館確有向南京大使館發出電報，說「領事館完全瞭解在目前鬥爭中避免介入任何一方的重要性。基於此項理由，領事館拒絕留下使用達姆彈的證據，而等待大使館之指示」。司徒雷登大使則於 3 月 5 日下午向華府國務卿致電：「大使館已通知布拉克，認可其避免領事館介入電報所述之事及委員會所提議由領事館傳播台北事件之新聞的要求。大使館並指示領事館繼續避免以官方或個人身份介入此內部之困難，並將與領事館的任何類似進一步接觸向大使館報告」。〈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致國務卿電〉，收入王景弘編譯，《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47。

18 以上引文參見：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263-264；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 264。

19 這段話的原文是：“The ragged Nationalist soldier prodding them along at bayonet point saw the

求援，我們卻以武裝和金錢捐助國民黨份子。[20]

（三）美國國務院對於台灣的政策就是「沒有政策」

如果我們要維持美國及聯合國在西太平洋防線上的利益，台灣就必須在友軍的手裡連成這條防線。……為什麼不趁我們在法律上仍有地位時來干涉？為什麼不堅持以聯合國或聯合行政來管理直到中國的內戰停止？如果我們一直要等到簽訂和約規定主權移轉以後，那麼我們將會陷入無可衡量的困難境地。我們必須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停留在中國大陸，至少不讓他們插足台灣。給與台灣人所追求的暫時性的託管政府〔Give the Formosans the temporary trusteeship they seek〕，然後，必要時讓蔣介石以平民身份避難到該島。用一切可能的辦法，使蔣介石不要像他正要失去大陸一樣地失去台灣。為什麼我們不讓台灣成為聯軍或美國控制之下的一個政策基地，直到戰後的亞洲達到某一程度的政治安定呢？

我想，這是我最後一次以半官方的身份提供我個人「帝國主義」者的論點，[21]遠東司長結束這項談話後送我到門口，有意的評論說，在聯合國及華府沒有任何人會對台灣發生興趣。

如果他加上「做為一個殖民地」「做為一個託管地」或者甚至於「在

American flag on my jeep, and gave me the smartest salute he could manage.” 宜譯爲：「一位衣著襤褸的國府兵以刺刀頂著他們前進，這個兵士看到我吉普車上插的美國國旗後，對我敬了一個他所能作到的最漂亮的禮」。原來的譯文容易被誤以爲是那四個年輕人向葛超智的吉普車（美國國旗）敬禮，其實主詞是那一位衣著襤褸的國府兵在敬禮。新的譯文參見葛超智著，詹麗茹、柯翠園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310。

20 以上引文參見：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300；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 306。

21 這是葛超智自我解嘲的用詞，事實上是指美國應如何積極介入的意思，從前後文可知葛超智不會認爲這樣介入就是帝國主義的行爲。葛超智與遠東司司長的這場談話是 1947 年 5 月 26 日下午五點半開始，而這位司長就是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1900-1972）。除了 1947 年 5 月 26 日這一場談話，1948 年 12 月葛超智再度與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部門的白德華「閉門會談」，學者蘇瑤崇因而認爲，1948 年下半年至 1949 上半年間，美國政府研議對台政策之際曾受葛超智託管論的影響。參見蘇瑤崇，〈沖繩縣公文書館藏葛超智（George H. Kerr）臺灣相關資料與其生平〉，《臺灣史研究》，卷 18 期 3，頁 240-241。

道義上的責任」的話，他還可能比較接近於實際，但是，他正講出國務院的政策，即對於這島「無政策」〔But he was voicing the Department's policy of "no-policy" for the island〕，「不管台灣的事，也沒有台灣的問題存在」。很快的，一個政策指引者就要公開聲明華盛頓認為台灣係「地理上、政治上、戰略上」屬於中國大陸之一部分了。

然而在國務院有些地方正埋伏了一些不安。六月五日（這天馬歇爾計劃正在哈佛召開），我被叫到國務院來準備一份長達一頁的個人觀點，以便在馬歇爾大會中發表。我在想，一個人怎麼可能在陳述一件案件時在基本政策與辯解上做完全相反的論點，一面指出美國可能受攻擊之點，一面又指出無助的台灣人尋求援助？我寫完報告之後，有一感覺，就是國務院中必須有人把這些「帝國主義者」的看法轉呈給馬歇爾將軍，但是在國務院中，沒有一位有經歷的人願意把他自己的名字與帝國主義者並列，而我的名字，對馬歇爾將軍或公眾來說，藉藉無名，沒有份量。[22]

（四）美國軍方不同意國務院的「拋蔣棄台」路線

〔1948 年〕十二月初，我被秘密地要求提出一些「可配合美國利益」的台灣人領袖。

唯一能提出的是一些保守的台灣人領袖，因為那些於一九四七年哀求我們援助的人物不是死就是逃了，等新一輩的人才出現還須一段時日。可能由於二二八事件及以後我們官員的行為，使台灣人對我們失去了信心。[23]

---

22 本小節引文參見：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319-320；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p. 327-328。

23 這段話的原文是："There was only one possible response; the conservative Formosan leaders—the men who had sought our help in 1947—were now dead or in exile. Some time must elapse before a new pattern of leadership emerged. Perhaps we had forfeited Formosan trust by our official behavior during the March crisis and thereafter." 宜譯爲：「對此我只能有一種回答——1947 年曾尋求我們幫助的，那一批保守的台灣領袖，不是已經死亡就是流亡海外，而新一代領導人的崛起仍需

但國務院走向拋蔣棄台路線時，美國軍方領袖堅持著相反的意見。我們無法沉默地忍受共產勢力的逐漸擴張，而將來可資反攻的基地卻逐漸縮小。巴都恩（Hanson Baldwin）代表軍方利益宣稱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保證龐大的軍援團有職權管制美國軍火之援助國府軍。外交委員會參議員亞力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敦促美國迅速接管台灣，並說他的建議得到麥克阿瑟將軍的支持。[24]

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國務卿向國內發布外交政策聲明說：「台灣無論從政治、地理或戰略的觀點上看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多年，歷史上曾屬於中國所有，政治或軍事上完全是中國的責任。」[25]

那天中國駐美大使正式向美提出要求繼續軍援。得到的回答是「不」，但在同一天，美國外交部在薰黑的台北領事館大樓重新設立使節團。駐華大使史徒雷登博士〔按：Dr. John Leighton Stuart〕和他的中國秘書菲立普．傅〔按：Phillip Fugh，傅涇波〕留在美國，把他的辦公室留給代理大使去接管。

一九五〇年元月五日，杜魯門總統正式宣布「放棄」政策，他依照慣例說是為了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性，因台灣已經由《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裏言明歸還中國。[26]

要時間。或許我們政府在三月危機及事後的作爲，已令台灣人喪失對我們的信任」。原來的譯文容易被誤以爲，葛超智有提出名單，只不過是一些保守的台灣人領袖名單；但原文的意思似乎是提不出名單，因爲所謂保守的台灣人領袖恰是那些 1947 年尋求美國幫助的人，不是已經死亡就是流亡海外。新的譯文參見葛超智著，詹麗茹、柯翠園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385-386。

24 以上引文參見：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370；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p. 381-382。

25 此段所指的應是〈美國務院對台灣政策備忘錄〉（1949 年 12 月 23 日），後半段的另一種翻譯是：「雖然由日本人統治了 50 年，但在歷史上該島一直是中國的。從政治和軍事角度，嚴格地說，該島純屬中國的內部事務」。梅孜主編，《美台關係重要資料選編（1948.11-1996.4）》（北京：時事出版社，1997），頁 66。

26 以上引文參見：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373；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 386。

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蔡斯（William C. Chase）少將在台北出任操縱全島美國人行動的軍事顧問團團長。該團逐漸擴大，直到顧問及助理人員達數千人之多。這些人員鞏固該島防衛，且準備有朝一日對中國大陸開戰。

一九五二年艾森豪將軍的競選得勝讓國民〔黨〕政府歡聲雷動。今後共和黨一向的競選諾言——即使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將會實現，而蔣介石從一九五〇年以來為討好美國在台灣所做的內部改革也將不是當務之急了。當艾森豪進入白宮的前夕，《時事、生活及幸福》雜誌發行人來台訪問，宣稱艾森豪將軍可能不久將終止封鎖國民〔黨〕政府對台海之行動自由，也就是解除台灣中立化。蔡斯將軍在一次大軍事會報時招待記者，他說：「我不給任何諾言，也不做何預測。但我相信明年事情將會改變。你們大概曉得我的意思。」[27]

（五）舊金山對日和約與台灣地位未定論

我們還記得國務院早時曾堅持中國領土完整必須恢復，台灣必須立即簽約復歸中國。這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杜魯門邀請杜勒斯擔任國務卿外交政策顧問時的官方立場。隨著來了六月危機——朝鮮事變——和總統聲明：「台灣將來地位之決定，需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與日和平解決（a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或由聯合國考慮。」九月八日杜勒斯先生受命交涉對日和平條約，因此，他通過風浪洶湧的外交折衝。這當然是極特殊的表現，因為他激烈的公開聲明和「戰爭邊緣」式的作風似乎全然支持蔣的領土主張，但他的官式行為和隱密的談判卻另有企圖。

不久，他發現有一個方法可制止或抵消那不幸的「領土完整」的約束。首先，他提議日本應僅放棄台灣主權，其後，島嶼之永久地位將由美、

27 以上引文參見：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390-391；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p. 406-407。

英、蘇和中國採共同行動來代表簽字國家決定。設使四強無法在一年內取得協議，問題應交聯合國大會處理。[28]

蔣氏絕不會同意此法，而中共又非聯合國一員，也非受邀參加舊金山和約的國家之一。一九五一年中，杜勒斯先生便表示，國民〔黨〕政府將不受邀且不簽約，因此，日本在舊金山放棄其對台主權，已將台灣名義轉移給簽約的四十八國，由他們共管，以待聯合國大會作最後的解決。條約在一九五二年生效，而這問題就如此擱下來。[29]

四、「出賣敘事」的進一步分析

眾所周知，二戰大戰後階段（1943）美國海軍曾計劃攻占台灣，稱為「鋪道作戰計畫」，但因麥克阿瑟將軍堅持要先攻下菲律賓，1944 年 7 月羅斯福總統採納了麥克阿瑟的意見，結果鋪道作戰暫緩，呂宋島、硫磺島、琉球群島的佔領被列為優先。何況，還有致命的（fateful）開羅宣言，提到台灣澎湖在戰後須「歸還中國」。[30]

歷史總是由許多的偶然與必然交織而成，羅斯福總統突然死亡，繼任的杜魯門總統頓時肩負起世界重任。誠如葛超智所指出：日本投降的對象是盟國而不只是中國，台灣原是日本的領土，其管轄權的轉換若沒有和平條約的擬定、同意和簽字，是無法成立的。這麼重要的「技術問題」為什麼被掩蓋？葛超智

28 這就是 1950 年 10 月 20 日杜勒斯交給顧維鈞由美國草擬的對日和約七原則的部份內容。顧維鈞問杜勒斯為什麼要向聯合國提出不該歸聯合國管轄的台灣問題？杜勒斯說他無法正式回答這個政策問題，但就他所知，美國凍結台灣問題、「維持現狀」的政策，對國民黨政府有利。詳見王景弘，《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199。

29 本小節引文參見：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408；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p. 427-428。

30 當然，葛超智對開羅宣言的批評亦不遺餘力，包括：擔心蔣介石可能退出戰場（私下與日本講和），羅斯福總統為了國內政治、為了討好國內的基督教團體而「對中國基督教領導人給予酬賞」，「在國務院裡，沒人提醒總統要去注意因承諾變更領土、移轉成千上萬人民的主權所隱含的危機」。總之，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分明是在「熊未死前，就已分割好熊皮」了。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 51-55。

認為國務院必須負責，因為杜魯門根本不知道台灣、他的國務卿也不清楚台灣的事，國務院裡面那些「中國第一者」（China firsters）似乎不曾努力把台灣問題提到愼重的政策討論階段，因為他們早已決定不應該有台灣問題這一回事。

回到葛超智本人，或許因來過台灣教書的情緣，1942 年亦即離開哥倫比亞大學到國防部任職那一年，就開始在 *Far Eastern Survey* 發表有關台灣（和琉球）的文章，包括：

1.（1942 年 2 月 23 日）"Formosa: Colonial Laboratory"（〈福爾摩沙：殖民實驗室〉），敘述日本在台灣的警政交通教育建設，以及台灣人的處境，認為台灣對日本而言，最有用的可能不是軍事基地，而是「支配種族」技術的社會實驗室。[31]

2.（1945 年 4 月 11 日）"Formosa: Island Frontier"（〈福爾摩沙：邊陲島嶼〉），比較詳細地敘述台灣早期荷治、清治、日治的歷史，特別是台灣多數住民（葛超智稱作福爾摩沙的中國人 Formosan Chinese）經過外來統治之後的文化樣貌。[32]

3.（1945 年 10 月 10 日）"Some Chinese Problems in Taiwan"（〈台灣的一些中國問題〉），討論日本人離開以後在台灣遺留的影響，中國政府對於這個得天獨厚的新領土應如何治理。[33]

4.（1947 年 10 月 15 日）"Formosa's Return to China"（〈福爾摩沙歸還中國〉），撰寫本篇文章的時間應是二月爆發事件前夕，葛超智批評中國人在台灣的治理貪汙腐敗，台灣已經瀕臨暴動邊緣。[34]

---

[31] George H. Kerr, "Formosa: Colonial Laboratory," *Far Eastern Survey*, 11:4 (Feb. 23, 1942), pp. 50-55.

[32] George H. Kerr, "Formosa：Island Frontier," *Far Eastern Survey*, 14:7 (Apr. 11, 1945), pp. 80-85.

[33] George H. Kerr, "Some Chinese Problems in Taiwan," *Far Eastern Survey*, 14:20 (Oct. 10, 1945), pp. 284-287.

[34] George H. Kerr, "Formosa's Return to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16:18 (Oct. 15, 1947), pp. 205-208. 前文談到台灣留學生盧主義在美國大學圖書館讀到 George H. Kerr 的兩篇文章讓他開了眼界，其中一篇〈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與經過〉經查並無此篇名，應該就是指"Formosa's Return

5.（1947 年 11 月 5 日）“The March Massacres”（〈三月屠殺〉），描述 2 月 27 日晚上緝菸事件開始的動盪，民間提出 32 條要求，基隆港軍隊登陸之後的屠殺，據可靠的估計在三月份共有五萬名至七萬名之間的軍隊進入台灣，大約有一萬名台灣人被屠殺。不過文章的結尾仍期待蔣介石徹底改革「唯錢是圖」的國民黨官僚體系以贏回台灣人的心，重建這個島嶼的經濟並且運用台灣人的技術能力而不是將兩者一併摧毀，否則進一步的動亂失序必再發生。[35]

以上連續六年的撰寫和發表，很像人類學者或社會學者的「參與觀察法」或「持續觀察法」，也可見葛超智深知「台灣問題」之存在，不像國務院那些「中國第一者」那樣「早已決定不應該有台灣問題這一回事」。不過，葛超智主張的解決問題之道——託管，前後內容也有一些不同。[36]

在開羅會議之前，也就是 1942 年 7 月 31 日，葛超智即曾撰文〈佔領與之後的台灣管理〉，說道：在號召台灣人起義幫助盟軍的策略上，聯合國應承諾（一）在符合聯合國戰略利益下，給予台灣人最大程度的自治；（二）佔領應爲暫時，在經由一段時間的政治教育過程後，透過公民投票而達到自治或是回歸中國等。[37]

但是當有了「開羅會議公報」，1945 年美國又同意並協助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葛超智基本上接受此一現實，即便發生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久——如

to China”（〈福爾摩沙歸還中國〉）這一篇。

35 George H. Kerr, “Formosa: The March Massacres,” *Far Eastern Survey*, 16:19 (Nov. 5, 1947), pp. 224-226. 文中所提三月份就有五萬至七萬名國民黨軍隊入台，數字恐有膨脹，根據大溪檔案，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於 1947 年 3 月 10 日給蔣介石的簽呈，謂台灣原有兵力外加兩次增援之後，合計兵力是：二十一師全部（五個團）、五個憲兵營、一個特務營。雖然還有「原有空軍地勤人員及要塞守備部隊，未列」，但也不能包括在三月入台的數字。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39-140。此外，葛超智文中說「大約有一萬名台灣人被屠殺」，「台灣人」原文是“Formosan-Chinese men and women”，令人費解，觀其前後文，“Formosans”顯指台灣人被殺數字，故逕譯爲「台灣人」。

36 包括託管而後復歸中國，以及託管而後獨立的不同。詳見蘇瑤崇，〈託管論與二二八事件——兼論葛超智（George H. Kerr）先生與二二八事件〉，《現代學術研究》，期 11（2001 年 12 月），頁 123-164。

37 蘇瑤崇主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編印，《葛超智先生文集（*Collected Papers by George H. Kerr*）》（台北：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2000），頁 33。

前所述他寫〈三月屠殺〉的時候，仍期待蔣介石政府徹底改革台灣政經以免再起動亂。不過，葛超智從 1958 年開始撰寫《被出賣的台灣》，至 1965 年該書出版的這段期間，台灣人已經在日本和美國有了各種不同的台獨運動團體，台灣島內也發生過蘇東啓等「台獨叛亂」案（1961）、[38]彭明敏師生「台獨叛亂」案（1964）；葛超智的立場早已是一介平民或學者，更能夠站在台灣主體的位置，否定「開羅宣言」的效力，主張台灣應該走向獨立。

再就美國政府的對台政策而言，儘管 1950 年元月 5 日杜魯門總統正式宣布的「放棄」政策，說是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性，台灣已經歸還中國；一般認為半年後改稱台灣地位未定，完全是因為韓戰爆發的緣故。但是已有研究指出，1950 年元月 5 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之際，根據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建議臨時做了重要的文字改動，就是在「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前面加上「目前」（at this time）兩個字，意思是將來可不然？而且在「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的局勢，或使台灣脫離中國」句子中刪去「或使台灣脫離中國」，意思是保留將來用武力使台灣脫離中國的可能性？[39]可見，政策的發展常是夾纏的，不宜用時間序列做「一刀切」的理解。

五、討論與結語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與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2007 年 2 月 22 日在美國華府舉辦一場「台灣二二八事件：1947 年 2 月 28 日的政治意涵」的討論會，邀請歷

---

38 蘇東啓（1923-1992），世居雲林縣北港鎮扶朝里。1961 年以他作為「案頭」的台獨叛亂案詳情，見陳儀深，〈台獨叛亂的虛擬與眞實——一九六一年蘇東啓政治案件研究〉，《臺灣史研究》，卷 10 期 1（2003 年 6 月），頁 141-172。應注意的是，葛超智書中敘述的刑期不確實，蘇東啓被判無期徒刑而非死刑，蘇洪月嬌判有期徒刑兩年而不是無期徒刑。

39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 134-135，「『不介入』聲明的伏筆」。

史學者 Steven Phillips、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以及卜睿哲等三位講者發表，其中卜睿哲發表的正是〈《被出賣的台灣》的作者——葛超智的角色〉（The Role of George H. Kerr, Author of *Formosa Betrayed*）。卜睿哲認為，葛超智撰寫本書是以參與式觀察者的身分，同情「多數台灣人」的立場，進行感性論辯的報導、譴責國民黨政權的種種罪行，也許我們應該把他放在美國的「揭發醜聞的新聞報導」（muckraker journalism）的傳統來看；卜睿哲質疑葛超智在 1958 年撰寫、1965 年出版此書時，距離 1947 年都已過了十幾年之久，無法保證記憶與眞實不會產生偏離。他進一步對照葛超智在書中所述與 1947 年所寫的電文或報告，發現他沒有把台灣人事變當時擁有武裝對抗國軍，以及處理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談判破裂時，由「惡棍」組成的一幫人將要轉入地下製造麻煩等事實寫入書中。卜睿哲歸納地說，雖然葛超智主要是根據事實材料，而不是根據消逝中的記憶來寫書，但是有他（如上述）故意留情不用力抨擊（pull his punches）的部份。

其次，卜睿哲最在乎的是葛超智藉著軟鼻彈事件指控美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袖手旁觀，且原因是「台灣已是中國的」（This was China now）。卜睿哲認為任何美國駐外大使或領事的首要責任都是照顧本國公民在當地的安全，也因此打交道的對象主要是當地政府（established authorities）；同時，領事館也不應成為身處危境之當地居民的避難天堂，所以當一些大陸人躲入美國領事館的時候，領事布雷克（Ralph J. Blake）迅速把他們移走，葛超智並沒有（公平地）把這件事寫進去。要之，布雷克必須嚴格遵守南京大使館給的訓令「不介入」（non-intervention）。最後，卜睿哲指出駐台北領事館曾在 3 月 3 日向南京大使館大膽建議「……唯一實際的解決辦法是美國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以阻止政府軍隊一旦在台北被放縱的屠殺之災難……」，[40] 領事館如此重要的建議，葛超智不應忘記——難道他故意忘記以免與他的論述

[40] 經查確有此份 3 月 3 日台北發出的電報，〈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致國務卿電（468 號）〉（1947 年 3 月 6 日下午七時於南京），收入王景弘編譯，《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頁 53-54。

（一切都是“This was China now”的美國政策使然）相矛盾？

筆者認爲，純就二二八事件期間而言，情勢突然而混亂，台北的美國領事館只有三人編制，又必須受南京大使館節制，或許已經負責盡分；但是葛超智撰《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是從太平洋戰爭說起，請問是誰允許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是誰幫助運送國民黨軍隊進入台灣？退一步說，儘管 1947 年 3 月 3 日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曾經發出那一封大膽建議的電報且已轉達國務卿，但其結果華府並沒有甚麼回響，所以卜睿哲上述滔滔雄辯對葛超智的批評，並不是那麼有效。況且，廣義的美國政府當然包括軍方，而《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已經寫到 1949 年軍方對於國務院的「拋蔣棄台」路線持著相反的意見，亦即對美國政府決策的複雜性有所交代。事實上麥克阿瑟在韓戰之前就一直鼓吹「務必防衛台灣以免落入敵對國家之手」，麥帥還曾經從政治的角度說：「戰爭期間盟國承諾在戰後把台灣交給中國的政治情勢，與現在已經完全不同。在道義上，美國應該給予台灣人民在不受共產警察國家桎梏的環境下，發展自己政治前途的機會」。[41]

不過，國務院也不是——如《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所一再譴責的——對台灣問題「無感」，或一直被「中國第一主義者」和基督教團體所挾持。上一段麥帥關懷台灣的言論是在 1950 年中國赤化以後提出，然而觀乎下列 1949 年的美國若干外交關係檔案，可以感知美國國務院對情勢的充分掌握以及決策過程的多面性：

1. 〔代理國務卿致杜魯門總統之備忘錄，1949 年 1 月 14 日〕鑒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利用政治與經濟手段避免福爾摩沙被赤化」的結論，國務院已經準備了相關的報告，目前正在國安會審議。要注意，美軍軍事補給現在被撤移至福爾摩沙，中國空軍與海軍也正在島上建立總部，再加上重要中國官員的家屬與財產也撤離至福爾摩沙，這一切都顯示中國政府在建設福爾摩沙，作為撤離大陸後的堡壘。……

41 王景弘，《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頁 190-191。

國務院充分瞭解到，美國可能有必要在某個階段採取軍事行動，來確保福爾摩沙不會被赤化。不過國務院強烈主張，為了福爾摩沙內部以及國際的政治理由，美國應該極力避免粗糙的單方面介入，介入的時候也還沒到。目前仍有可能在當地扶持一個非共產的中國政府，由它成功地阻絕共產黨。

2.〔有關美國對福爾摩沙立場之國安會草擬報告，1949 年 1 月 19 日〕目前福爾摩沙與澎湖的法理地位是：它們是日本帝國的一部份，有待和平條約做最後的處置。美國立場遵循由英、美、中三國元首所作之開羅公告，自日本投降日開始即推動並承認中國對這些島嶼的實際控制。……福爾摩沙人反日本也反中國，希望在美國或聯合國的保護之下獨立。但是本土福爾摩沙人缺乏政治經驗，沒有組織，也沒有很強的領導。……中國則在 1947 年的福爾摩沙人起義失敗中摧毀了大部份的領導人才。目前所知，島上至少有一個素質頗值懷疑的小型台獨團體。香港與大陸的福爾摩沙難民強力發聲，但是規模太小，無法獨力在福爾摩沙組織成功的革命。

3.〔國務卿於國安會第 35 次會議有關福爾摩沙議題之發言，1949 年 3 月 3 日〕……在嘗試將福爾摩沙與大陸切割之際，我們面對了遍及大陸的「收復國土」主義所可能造成的威脅。在滿洲及新疆，蘇聯的行為挑起了「收復國土」議題，……我們最急切要避免的，就是自己也去挑起同樣的議題。我們不能公然顯示對福爾摩沙的興趣，……如果我們想在福爾摩沙成功執行目前的政策，想讓福爾摩沙脫離大陸掌控，我們必須小心隱藏這個願望，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42]

[42] 以上三段資料，皆摘自“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Formosa (Taiwan): Concern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Possible Conquest by Chinese Communists,”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Ⅸ, pp. 261-471。

所謂政策多面性的另一種意涵就是矛盾性，就是同一段時間內存在著切割或連結、放棄或掌握的兩種意見。換言之，觀察美國對台與對中政策的演變，不能只注意到韓戰，或是 1949 年 8 月發表的《對華政策白皮書》（美國與中國之關係）和 1950 年 1 月 5 日的杜魯門總統聲明，事實上國務院在此前後一直在評估「將福爾摩沙與大陸切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令人感慨的是，台灣人在那時代鉅變、命運交關的當口，果眞「缺乏政治經驗，沒有組織，也沒有很強的領導」嗎？若然，在乎主體性的台灣人與其追究台灣何時、如何被出賣，不如隨時檢討自己的條件，努力提升自己的品質。

總之，美國政府在二戰後的幾年確實遵循開羅會議公報，承認台灣為中國屬島，且幫助中華民國接收管理台澎，甚至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沒有對台灣人伸出援手，從而被葛超智批評為出賣（或背叛，betrayed）；葛超智從國際上處理殖民地歸屬的常理常規認為台灣地位未定，應經託管，表面上沒有被美國政府接受，但是至少軍方在 1949 年並不同意國務院的「拋蔣棄台路線」；1950 年韓戰爆發以後杜魯門總統明白揭櫫台灣地位未定論，不再認為台灣是中國屬島，顯然他們對台灣法理地位的認知前後並不一致。從美國外交檔案可知，美國政府對部份台灣人追求獨立（台灣主體）的願望並非不知，但此時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已進駐且有效控制台灣，美國選擇的平衡做法是——透過舊金山對日和約等作為，一方面不承認台灣是中國屬島，也聲明美國對它沒有領土野心；但另一方面順水推舟扶助蔣介石重新開始，同時開啓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台灣與中華民國命運交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歲月。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及史料彙編

〈中央通訊社參考消息央秘參（55）1032 號：薛光前駁斥卡爾著作〉（1966 年 8 月 5 日發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北美司檔案》，檔號 406/0071，「僞台灣獨立聯合會．第六冊（1965 年 7 月-1967 年 1 月）」。

〈摘錄：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第 218 次會議議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北美司檔案》，檔號 406/0071，「僞台灣獨立聯合會．第六冊（1965 年 7 月-1967 年 1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王景弘編譯，《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梅　孜主編，《美台關係重要資料選編（1948.11-1996.4）》，北京：時事出版社，1997。

蘇瑤崇主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編印，《葛超智先生文集（*Collected Papers by George H. Kerr*）》，台北：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2000。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Formosa (Taiwan): Concern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Possible Conquest by Chinese Communists,"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IX, pp. 261-471.

二、專著

卜睿哲（Richard C. Bush）著，林添貴譯，《台灣的未來：如何解開兩岸的爭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王景弘，《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下冊，台北：國史館，2013。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衛城出版，2011。

陳儀深訪問，簡佳慧等紀錄，《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葛超智（George H. Kerr）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葛超智（George H. Kerr）著，詹麗茹、柯翠園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台灣教授協會，2014。

蘇　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Irvine, CA: Taiwan Publishing Co., 1992, second edition.

三、論文

陳儀深，〈台獨叛亂的虛擬與眞實——一九六一年蘇東啓政治案件研究〉，《臺灣史研究》，卷10期1，2003年6月，頁141-172。

賴怡忠，〈1971 年以前的美中台三角關係——美國對台政策變遷：由「地位未定」、「兩中」、到「一中」的轉變〉，收入薛月順執行編輯，《臺灣1950-1960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25-44。新店：國史館，2007。

蘇瑤崇，〈託管論與二二八事件——兼論葛超智（George H. Kerr）先生與二二八事件〉，《現代學術研究》，期11，2001年12月，頁123-164。

蘇瑤崇，〈沖繩縣公文書館藏葛超智（George H. Kerr）臺灣相關資料與其生平〉，《臺灣史研究》，卷18期3，2011年9月，頁229-256。

Kerr, George H., “Formosa: Colonial Laboratory.” *Far Eastern Survey*, 11:4 (Feb. 23, 1942), pp. 50-55.

Kerr, George H., “Formosa: Island Frontier.” *Far Eastern Survey*, 14:7 (Apr. 11, 1945), pp. 80-85.

Kerr, George H., “Some Chinese Problem in Taiwan.” *Far Eastern Survey*, 14:20 (Oct. 10, 1945), pp. 284-287.

Kerr, George H., “Formosa’s Return to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16:18 (Oct. 15, 1947), pp. 205-208.

Kerr, George H., “Formosa: The March Massacres.” *Far Eastern Survey*, 16:19 (Nov. 5, 1947), pp. 224-226.

四、網路資源

〈台灣教授協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5%99%E6%8E%88%E5%8D%94%E6%9C%83。（2013年6月30日檢索）

〈賴怡忠〉，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B4%E6%80%A1% E5%BF%A0。（2012年10月12日檢索）

Taiwan: Autonomous Polity, Island belonging to China, or Something Else?——On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as revealed in Kerr's *Formosa Betrayed*

Chen Yi-shen*

Abstract

George H. Kerr (1911-1992) published *Formosa Betrayed* in 1965. He had served in the Japan-Manchuria Branch of the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articipated in planning for the occupation of Taiwan, and was the U.S. Deputy Consul in Taiwan when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of 1947 erupted. *Formosa Betrayed* expressed his observations of post-war Taiwan on the one hand, and his view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 (undetermined) as well as his criticisms of U.S. policies towards Taiwan on the other. The book became a sort "Bible" for numerous overseas Taiwanese youths in their move toward Taiwan independence. However, only now with newly available archives can we check the accuracy of Kerr's account. This article maintains that Kerr possesse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issues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a scholarly approach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r "continuous observation." Kerr not only wished to evaluate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nd U.S. policy, but also to give voice to the sufferings of Taiwan's people under the cruel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60s.

Keywords: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Taiwan's status, Taiwan-U.S. relations, Richard C. Bush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